本版编辑：张丹丹
E-mail：t2@studytimes.cn
Tel：010—62807315

战略视角

新加坡家庭政策的调适与创新

□ 郑　寰

生育问题关乎国家的根本，涉及种族的延续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费孝通先生曾在《生育制度》一书中提出，“生育制度的功能是在维持社会结构的完整。人口太多或太少对社会上每个人的生活都会发生一些不良的结果”。如何有效地统计、预测和管理人口消长，积极应对社会结构所产生的深刻变化，对世界各国政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艰巨的考验。新加坡建国50年，从实施“两个就够了”家庭计划政策转变为全面鼓励生育。

应时而变：从控制人口到全面鼓励生育。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战后婴儿潮和大量移民涌入，新加坡人口出现了迅猛增长，人口出生率在巅峰时期达到4.5%。由于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公共资源供给不足，使得失业和住房成为国家发展的难题。由此，新加坡政府不得不实行家庭计划，推出了“两个就够了”的生育计划，旨在有效控制人口增长。“两个就够了”的计划生育政策曾在新加坡崛起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时过境迁，随着社会情势变化，此项政策的负面效应也逐渐暴露出来。新加坡第四次人口普查显示，1975年新加坡的总生育率开始低于替代水平，1977年已经掉到替代水平以下，到1980年，达到了历史最低水平。这一数据引起了新加坡领导层的警觉。尤其令人担心的是，新加坡人的婚姻观念出现了变化，不婚与晚婚比例渐高，单身率、离婚率普遍上升。并且，由于出生率的下降，人口得不到及时补充，在职劳动人口需要负担的老年人口比重也越来越沉重，由此引发的延迟退休、医疗支出增加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逐渐暴露出来。

新加坡领导层认识到，生育和婚姻事关国家发展，必须及时调整政策方向。如果任由生育率持续下降，人口结构将日益老化、劳动队伍将逐渐萎缩，经济将逐步走向衰败。因此，在1983年的国庆群众大会上，李光耀总理发表了题为“婚嫁大辩论”的演讲，提出要依照教育程度差别鼓励婚姻与生育。该政策规定，受过高等教育的夫妇若生育三个或以上的子女，可享受特别所得税优待，子女还可享有优先进入重点学校的权利。虽然这项政策由于饱受争议未能长期实施，但新加坡政府却在1984年果断放弃了“两个就够了”的人口政策。1987年正式提出，“只要有能力，生三个小孩或更多”的新人口政策。自此，由控制生育转变成全面鼓励生育。

面对新的环境，原有的人口计生机构已经难以适应时代要求，迫切要求政府职能从人口节育控制迅速转变为家庭综合发展，整合多方面资源打赢这场“人口仗”。为此，新加坡政府在1986年解散了家庭计划协会，逐渐建立了以家庭发展为中心的组织机构，这已经远远超出狭义的人口政策范畴。新加坡政府认为，稳定和坚固的家庭对于社会和谐和稳定至关重要，家庭政策的目标，就是要营造一个有助于促进家庭纽带的社会环境。2006年，新加坡正式成立了国家家庭委员会，后更名为“凝聚家庭理事会”，该机构聚焦家庭议题，致力于推动家庭的良性发展，稳定社会的根基。在2012年，新加坡进一步将原有的社区发展、青年和体育部进行改组，专门成立了社会及家庭发展部，由此确立了家庭政策的核心地位。该机构将多方面的资源整合到一个大部门，承担了促进家庭发展、社会援助、康复和援助、老年人照顾等方面的职能。

加大物质激励，系统实施“婚姻与育儿配套政策”。政府从住房、养育、医疗、假期等方面打出了一套政策组合拳，相继出台了减轻赋税、优先小学注册、医疗补助、儿童照顾补助、育儿假、育婴奖励等政策。据统计，生育一、二胎的新加坡夫妻可获得各种补助高达16.6万新币补助。其中，“婴儿花红”（Baby Bonus）是最直接的现金奖励，新加坡政府相继在2001年、2004年、2008年、2012年不断提高补助水平。按照最新规定，2015年1月后出生的婴儿，可获得不同额度的现金资助：一胎和二胎可获得8000美元的奖励，三胎以上可给予10000美元的奖励。该笔款项将分成4期拨入申请人指定户头中。同时，父母可为子女于特定银行中开设儿童培育账户，在儿童满6岁之前，政府将按照父母存入该账户的款项，存入一笔对等的金额。存入金额第2胎上限为6000新币，第3、4胎为12000新币，第5胎以后的存入金额更高达18000新币。家长可在核准机构使用该笔储蓄，支付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费用。

实施精准打击，切实降低养儿育女的经济负担。在住房分配政策的制定上，政府为打消国民养儿育女的心理顾虑，向支持家庭发展的方向倾斜。目前新加坡有87%的国民居住在组屋，以家庭为中心的组屋计划成为有效运用公共资源解决社会问题的最成功典范。组屋政策主要有三种类型，对结婚生子的家庭给予了特别优惠：一是首次购房者计划。规定申请必须是以家庭为单位购买组屋，且首次购房最高收入上线约为3500新币。这意味着，未婚单身人士不可以申请首次购房，只能以较高价格购买二手组屋。此项规定旨在鼓励年轻人及早考虑人生大事，如果男女双方薪酬水平超过了组屋的上限，就会白白失去此项福利。二是三个或以上子女家庭优先购房计划。针对低收入家庭购买组屋，政府则根据具体情况最高给予4万新币的补贴，提供优惠鼓励转换较大组屋，便于改善生活质量。三是已婚子女与父母同住申请有限购房计划。为鼓励世代同堂、大家庭相邻而居，彼此照应，政府特定设计出一种三房式和一房式相连的新组屋，方便年轻人照顾老人，也便于老年人和孩子们相处。

构筑社会安全网络，实施“家庭帮扶计划”。为营造有利于家庭发展的社会环境，政府着力强化社区力量，减轻低收入家庭的养家负担，让他们能够使用社区公共资源，提供了儿童照顾与老人照顾等服务。2005年，新加坡政府专门设立了社区关怀基金，该基金总额已达到10亿新元，其中的社区关怀成长计划主要是针对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帮助低收入家长来负担孩子发展的费用。如果一个低收入家庭因工作没人照顾年幼的小孩，便可申请幼儿园或学生托管中心的学费补贴。同时，在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扶持下，还在主要社区设立了43个家庭服务中心，由志愿福利组织具体负责运营，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提供专业社工服务。社会工作者可提供婚姻咨询、婚前建议、儿童养育、家庭暴力、经济困难以及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咨询和帮助。

弘扬家庭价值观，推动家庭教育计划。新加坡政府在1991年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树立了“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的理念。新加坡政府认为，家庭是社会稳定的力量，为使国人了解家庭的价值，社会与家庭发展部推动了一系列家庭教育计划，弘扬传统家庭价值观念，以家庭财务管理、两性关系、亲子关系为主题，召开讲座、座谈会、研讨会，引导参加者更加有效地沟通交流、协调共识，处理家庭矛盾冲突和价值分歧。为了缓和女性大学毕业生的婚姻问题，新加坡政府甚至充当起“月老”的角色，在1984年成立了社交发展署，人民协会则成立了社交俱乐部，推动男女大学毕业生之间的社交活动。并且，为让新加坡人能够花更多时间与家人相聚，家庭凝聚理事会还会定期举办“家庭凝聚欢庆会”“家庭野餐会”等活动，鼓励夫妻、母亲、孩子以及旁系亲属一起用餐、游玩，以此增进家庭成员的互动和感情。

人口萎缩已经成为威胁新加坡国本的关键问题。尽管新加坡政府煞费苦心，连续实施了多轮鼓励结婚和生育的政策，但遗憾的是，新加坡的生育率仍未能达到替代水平。1990年代以来，新加坡生育率持续下跌，2015年排名全球倒数第一。为保持国际竞争力，新加坡政府只能吸引外来移民，来实现劳动力的补给。根据2013年发布的《人口白皮书》预测，到2030年新加坡外来人口的比例将接近一半，这引发了新加坡国民的恐慌和担忧，有可能引发一系列负面效应。面对人口消长、社会结构变化所带来的现代化挑战，人民行动党推动了许多政策创新，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是这些政策的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

他山之石

国外社会如何构建诚信体系

□ 梁国亮

诚信与法治是社会和谐和市场经济有序、高效运行的两大基石。无人值守的瓜棚，无人检票的公交车、地铁站，汽车自动避让行人，即使无人监督也不闯红灯，在国外游览时经常会看到这些现象，它们的背后是长期的、多方面的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注重覆盖全民的诚信教育

信用体系的基础是良好的教育。教育学生成为一名诚实的公民远比通过一门课程重要得多，这是很多国家的教育办学理念，学校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地方，也是道德教育的重要场所。

美国从幼儿园起就重视对孩子的诚信教育。波士顿大学教育学院设计的基础教材突出诚信教育。面对中小学生，以有趣的故事来传递诚信理念，向学生讲解“最大限度的诚实是最好的处世之道”的谚语，让学生制作诚信标语在教室里张贴。在瑞士，公德教育深入人心。谈及子女教育问题时，绝大多数瑞士人都表示，子女将来成就什么大业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做到遵纪守法，正直善良。尽管瑞士有完善的国家信用体系和严格的法律保障，但这一体系的根本基础则是全体公民的公德意识，是全体公民的自觉自律。

在日本，“诚实”是很多学校的校训。诚信教育贯穿学生学校生活的始终直到大学毕业。家长也很配合学校的教育，不许孩子说假话。到了社会上，说假话仍被认为是最大的问题。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如果被认为说了假话，就会失去人们的信任，被人瞧不起。在日本，造假是一件比坐牢还严重的事情，造假被发现基本上意味着个人发展到此为止了。工作之后，“诚信”是普遍的经营理念。日本公司有企业伦理教育。很多企业的经营理念都是“诚实”，“诚实”是许多企业和企业家的座右铭。

德国则更加重视家庭中的诚信教育，父母是孩子道德教育的启蒙者，家庭是道德教育的重要场所。德国教育法中明确规定：家长有义务担当起教育孩子的职责。父母会以身作则教导孩子。比如带孩子过马路，没车也不闯红灯；带孩子坐无人检票的公交车，教孩子学会上车前主动买票；给孩子建立银行账户，从小不赖账；与别人约会前，在笔记本上记录下时间，做到准时赴约。

完善立法和社会信用制度

很多国家以立法确认了公民必须在各项社会活动中遵守诚信原则。加拿大法律规定，在选举、商业活动、雇佣关系、学术研究中，都要遵循诚信。瑞士1912年《瑞士民法典》规定：“任何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均应依善意为之。”所谓善意，就是要以诚实、信用为基础。美国用《公平信用报告法》（FCRA）、《平等信用机会法》、《公平信用结账法》、《诚实租借法》、《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等16项法律构成了国家信用体系的法律环境。德国《商法典》（HGB）规定，成立公司必须在地方法院通过公证进行商业登记注册。商业登记包括公司形式、地址、注册资本、工商注册号、法人代表、主要股东等内容。商业登记簿可公开查阅。《破产条例》规定，企业破产必须到当地破产法院申请，并对企业和消费者破产的条件、程序作出规定。德国《民事诉讼条例》对债务人名单的建立、公布和销毁作了明确规定。无偿还能力者可到地方法院做代替宣誓的保证，地方法院将此记录在债务人名单内，并在全德范围内予以公布。有关个人信用的负面记录保留三年，消费者三年内无权享受银行贷款、分期付款和邮购商品等信用消费。

除了法律规定，很多国家都建立起了完备的社会诚信制度。加拿大有白卡制度。“白卡”是由加拿大政府人力资源部核发的社会保险卡，是对个人信誉的社会化管理。“白卡”对于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的不诚实行为进行记录，包括欺诈、偷盗、赖账、打架、种族歧视等都会记录下来。上学、就业、买房、买车、出国都要出示“白卡”，一旦有不良记录，申请者多半会失去各种机会。因此，遵守和维护自己的诚信，是在加拿大生活的必要条件。加拿大银行涉及个人的呆坏账很少，低于5%，贷款按揭买房、买车的还款率很高。在经济活动中约有一半买卖交易是在不签约的情况下进行的。不仅因为社会已形成良好的习惯，还在于“白卡”这种社会信誉管理制度。瑞士建立了全面的数据采集系统。经济社会中个人的负面信息，如消费者拖欠、赖账、避债破产及犯罪记录，都会被采集录入。德国建有全民信用数据库，储存了所有在德国居民的各类信用信息，信用体系采用0—100的评分制度打分，分数越高信誉度越高。美国不仅有着完善的个人征信、评信组织机构，而且信用信息已进入市场化运作。信用局是美国个人征信评信机构，是个人信息的采集、整理、评估、发布机构。信用局是私营机构，独立于政府和其他组织为信用信息的使用者提供服务，政府对它只进行立法规范。信用局必须保持第三方独立性，如果与政府或企业及其他组织走得太近，它的公平性就会受到质疑，同时其信用产品、信用报告和信用评分如果与实际不符，也会被人质疑其质量而被市场淘汰。美国的三大信用局和1000多家地方信用局收集了1.6亿成年人的信用资料，每年出售6亿多份信用报告。为保障个人信息不被滥用，对信用产品的销售使用，法律明确规定：到信用局调用他人信用资料需得到被调用人同意或司法部门授权。

不诚信和欺诈行为，会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高额的罚款。正如加拿大法律所言：如果你不诚实乃至于欺骗，你就要为此付费。挑战诚信后果会很严重。德国《反不道德支付法》规定，客户在收到账单30天后或在账单规定的付款截止日后30天仍未付款，债权人可加收超过银行贷款利率5%的滞纳金。如客户在收到连续三次催账警告后仍置之不理，债权人可向地方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德国，若一个人乘公交车逃票，在应聘时，会因为诚信问题很难被录用。在瑞士，乘坐公交车、火车，无票或买短途票乘长途车，会收到高额罚单；未按规定进行垃圾分类，乱停车阻碍他人出行，达到一定程度，将被邻居视为“没有信守保持良好居住秩序的约定”，可能被房东扫地出门，再想租到房也非常困难；对未诚实履行纳税义务的公民，地方政府有权向社会公布他们的姓名，由此承受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可能被企业辞退，贷不到款，甚至亲朋也对其冷眼相看。

加强公务员和高校学术诚信的法律制度建设

公务员和高校学术诚信是社会诚信的特殊人群和特殊领域，对全社会诚信有重大影响和引领作用，因此许多国家有严格的规定。

公务员诚信方面，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和欧洲各国颁布了道德法典。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美国政府行为伦理改革法案》，韩国1981年颁布《韩国公职人员道德法》，日本1999年通过《日本国家公务员伦理法》。这些严密的法律、法规体系成为公务员遵守诚信的有效制约机制。廉洁度较高的国家还对政府公务员进行诚信记录和考察。新加坡实行公务员公积金制度，公务员到正常离职或退休时未发生失信于宣誓承诺的行为，可获得一笔可观的公积金，保其后顾无忧；如果公务员任职期间诚信上出现问题，其公积金必须上缴国库。

高校学术诚信方面，加拿大著名学府圣力嘉学院在学校行政政策中有专设的学术诚信条款，学院认为要想成为世界上真正的有深厚影响力的高等学府，诚信是根本的要求。美国大学制订有学生学术诚信条例，对考试作弊、论文抄袭等学术不诚实行为，从定义、表现形式到申辩程序与处罚规则都做了详尽规定。联邦政府在“廉洁与效益总统委员会”下设“科研不端行为工作组”。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韩国与日本虽未设官方机构，但通常由资助科研的研究理事会或基金会制定规定，调查和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对违规者决不姑息。

总之，诚信在很多国家已成为社会普遍共识。这种共识来自于教育培养以及法律和诚信制度保障，并在社会实践中逐渐积淀形成为民族文化与传统。

环球瞭望

法国博物馆运营的资金来源

□ 张舜玺

博物馆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保护、研究、展示人类及人类环境遗存，推动人类发展的重要职能。博物馆的运营与资金密切相关，法国博物馆运营的资金来源是多方面的。

政府拨款是公立博物馆资金的主要来源。大型公立博物馆因其肩负公共文化服务和展现法国国家形象的双重使命，国家对其投入力度较大，政府拨款一般占其总资金来源的60%以上。地方中小型公立博物馆的运营也主要依靠政府投入。但仅靠政府拨款无法满足博物馆日常运营的需要，博物馆需通过自有资金进行弥补。这要求公立博物馆不断拓展政府投入之外的其他资金来源。而对没有政府补贴的私人博物馆来说，筹措资金能力的优劣更是直接关乎到博物馆的存亡。

门票是法国博物馆收入的重要来源。尽管近年来公立博物馆推行了部分免票的政策，如18周岁以下免费（欧盟成员国居民26周岁以下免费），每月设立免费参观日等，但门票仍然是博物馆自有资金中最重要的来源。以卢浮宫为例，2014年门票收入6500万欧元，占自有收入的64%。而一些博物馆甚至不惜背离公共服务的使命，通过提高门票的方式增加收入。如蓬皮杜文化中心十年前的参观票价是5.5欧元，现已提高到14欧元。

寻求社会赞助是博物馆广泛运用的资金筹措方式。从方式上看，社会赞助可分为实物捐赠和资金捐赠两类；从主体上看，社会赞助可分别由个人、社团组织、企业实施；从性质上，社会赞助可分为非商业和商业两部分。法国税法是世界上对文化赞助最大方的国家税法，2003年颁布的赞助法规定了极其优惠的税收减免制度，分别对不同主体、不同类型的赞助给予大幅度的税收抵扣。在税收的激励下社会力量踊跃赞助博物馆事业。2014年卢浮宫收到的社会赞助达1200万欧元，比上年新增55万欧元，占全部自有收入的12%，是继门票之后第二大收入来源。博物馆也根据社会的发展不断创新寻求社会赞助的途径。众筹是近年来的新生事物，博物馆很快将这种新方式纳入了赞助体系。2010年卢浮宫发起“全民赞助”行动，民众可通过网络进行捐赠，捐款人将获得66%的免税、“行动大使”称号及受邀到博物馆参加特别活动等不同鼓励。迄今该活动已顺利为胜利女神像修复、镶有珠宝的18世纪“和平桌”的购买等活动筹措到所需款项。其他博物馆也分别开展类似的众筹行动。奥赛博物馆发起了一项众筹计划，筹集到3万欧元，用于修复19世纪法国画家库尔贝的名作《艺术家的画室》。罗丹美术馆通过鼓励观众购买额外的门票筹集资金用于购置罗丹几幅稀有的素描作品。在展览中引入商业合作是博物馆筹措资金的新方式，对于赞助商给予一定的回馈也是博物馆界的通行做法。但巴黎近年来出现的显著带有广告效应的几个“奢侈品”展览，如路易威登在巴黎市卡尔纳瓦莱博物馆办展，卡迪亚公司在大皇宫办展，还是引起了人们对博物馆独立性的质疑。博物馆在获取商业赞助上，仍在不断探索，力求在商业目的与博物馆独立性之间取得平衡。

商业经营为博物馆收入注入了新生力量。博物馆作为一个非营利机构并不排斥商业活动。商业活动带来的收益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博物馆日常运营的资金缺口。法国博物馆的商业经营主要体现在开发、出售出版物和衍生品，场地租赁，藏品影像授权三个方面。2014年卢浮宫在商业经营上的收入达到了1300万欧元，这与其大力开辟经营种类和范围有密切关系。卢浮宫将展览与文创产品的开发紧密结合在一起，在临时展览中展出源自藏品的文创产品，还开辟网上商店专门经营以油画复制品、珠宝配饰、丝巾配饰、耳环项链、工艺品等为主的博物馆文化商品，数量达300种之多。场地租赁、出版物的销售和影像资料的授权也为卢浮宫带来了丰厚的收益。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博物馆商业经营活动很有特色的一个方面，是国家博物馆联合会（简称RMN）作为一个具有商业性的公共机构参与各博物馆的委托经营，管理博物馆藏品的影像授权。RMN目前获得了68个博物馆的图像资料，约60万个图像，每年约9万个图像被授权使用，年收入约360万欧元。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均可通过互联网检索各博物馆藏品图像，付费给RMN获得图像授权。付费完成后RMN根据与各博物馆的合约，返还一定费用给图像来源馆。数字化、网络化进一步拓宽了博物馆商业经营的收益。

出借藏品也为博物馆带来了一定收入。出借藏品换取收入已成为了博物馆行业的惯例，法国许多博物馆收藏大量名贵藏品，这些藏品通过短期出借的方式，尤其是国外巡展，为博物馆带来了丰厚的收益。奥赛博物馆曾组织高更、梵高、莫奈等名家名作国外巡展，盈利1000万欧元，用于填补该博物馆大型维修工程的资金缺口。卢浮宫2014年度报告显示，卢浮宫有3万多件作品在法国其他省份的博物馆展出，2000余件作品在世界各地展出，在借展上的收益达到500万欧元，占全部自有收入的5%。从趋势上看，越来越多的法国博物馆通过把名藏品送去国外临时展出增加收入。

建立海外分馆拓宽资金来源。2007年法国与阿布扎比签署了一份世纪合同，卢浮宫在阿布扎比建立中东分馆。合同约定，授权阿布扎比博物馆使用卢浮宫的名称将为法国卢浮宫带来4亿欧元的收入，法国博物馆在十年内向阿布扎比出借作品可带来1.9亿欧元的收入，法国15年内在阿布扎比举办的临时展览，不仅所有的展览费用由阿布扎比承担，阿布扎比还需要额外向出借作品的法国博物馆支付500万欧元的报酬，最后阿布扎比还需向法国支付专家咨询费，这笔费用将按比例分配给提供专家的各博物馆。该合作计划预计能为法国卢浮宫创造超过10亿欧元的收益。随后法国其他大型博物馆也开始实施海外建馆方案，2015年3月，蓬皮杜文化中心在西班牙马拉加建立的临时展馆落成，蓬皮杜文化中心总裁阿兰·瑟班宣布，计划在全球建立多个蓬皮杜艺术中心临时展馆，首选地区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

投资与设立投资基金。设立基金通过理财的方式为博物馆运营提供“长久的赞助”，也是近年来法国博物馆筹措资金的一种方式。一般来说，设立基金主要用于购买新的藏品。随着博物馆的运营，基金的收益用来购买藏品、开展修复、配备安全防护措施等活动。投资和借助金融市场获利也成为博物馆创收的重要方式。